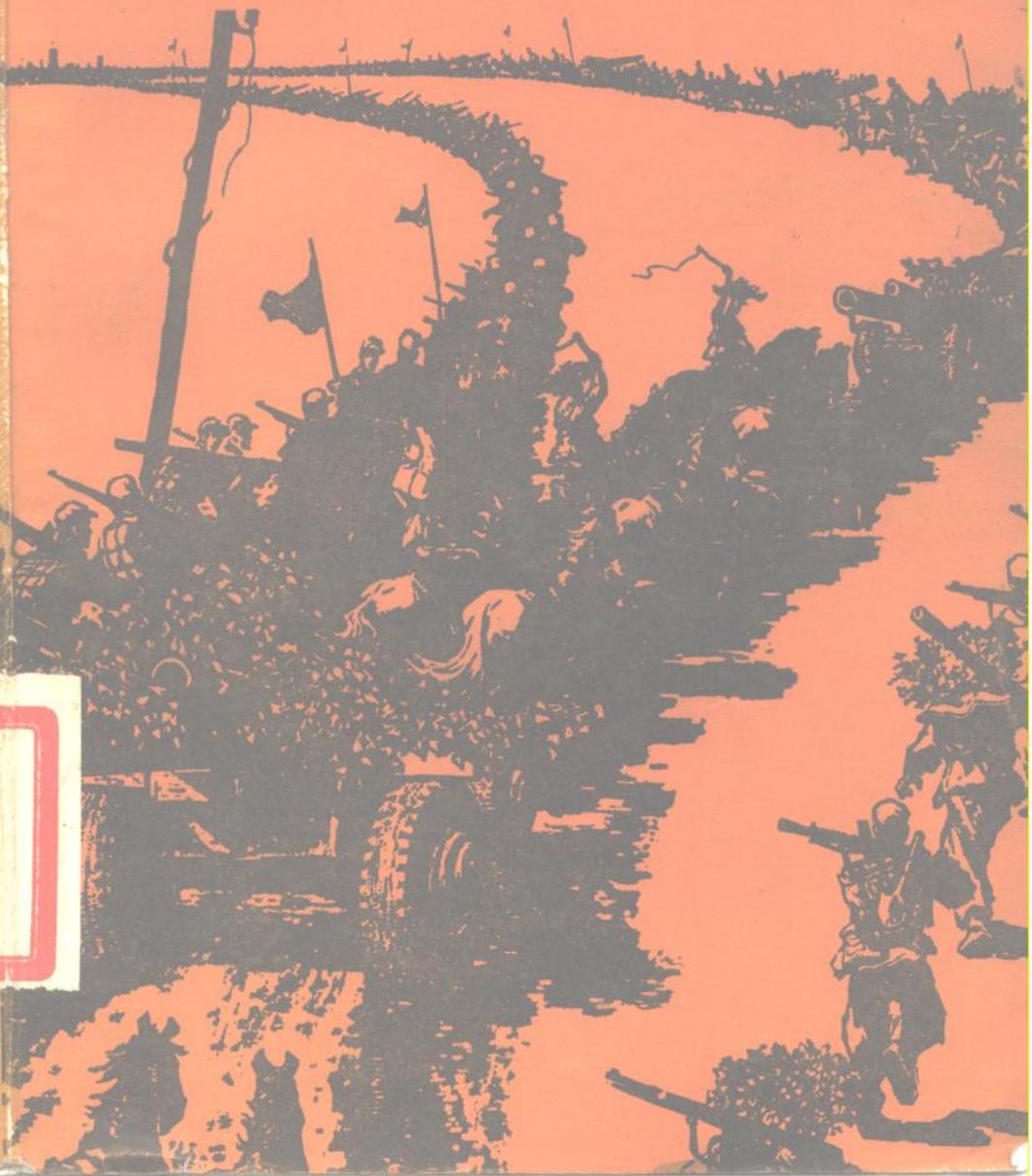


中國人征服中國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中国人征服中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刘维宁 何政安 郑刚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6430

北京出版社



1006430

Anna Louise Strong

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49

中 国 人 征 服 中 国

Zhongguoren Zhengfu Zhongguo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刘维宁 何政安 郑刚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7,000 字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600

书号：11071·214 定价：1.55 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与周恩来同志合影(1965, 上海)

前　　言

国际知名的美国进步作家、国际主义的坚强战士、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长眠在我国大地上，已经十四年了。她的一本重要著作《中国人征服中国》，根据她的亲身采访经历，记述了我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是一本富有历史价值的、生动活泼的书；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更感此书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斗争历史。

斯特朗同志是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的。在短暂的停留中，她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明快的思辨能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以及她对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坚强信念，都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喜幸此书的翻译出版，同时也深切怀念值得我们学习的斯特朗同志！

薄一波

1984年7月7日

I

序

看到《中国人征服中国》的中文译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形象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延安的窑洞里，我同这位美国共产党员和著名的记者曾经多次谈话。在她同毛泽东谈话时我曾为他们当翻译，当她听到“纸老虎”这个词时，她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毛泽东同志离开延安之前她再三要求留下来同我们一起过游击战的生活；但毛泽东同志考虑她年纪大了，特为约见了她，劝她乘“美军观察组”的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她又来到北京，向美国人民写了许多《从中国的来信》。……凡此种种，历历在目。她是许多美国朋友中我所最熟悉的一个。她把她的后半生倾注在增进中美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这一伟大的事业上面。我们永远纪念她。

在第二章第二节她引用我的谈话的地方，我稍有修改。如果她还健在，她一定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陆定一

1984年6月11日北京

读白皮书

——代序

一部冗长的历史忏悔录——《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由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般都称它为白皮书。我把它同本书的校样一道读过之后，对外交官们所掌握的精彩情报，深感钦羡。几年以前，他们就已经掌握了关于中国的全部必要的背景资料。

他们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就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能够存在是因为人民赞成、拥护他们，并且全心全意同他们一道战斗”，“这基于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革命……稳健而民主”，这次革命“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他们知道，“普通人民第一次懂得了自己为什么而战斗”，同时，“如果任何一个政府……剥夺了他们这些新获得的胜利果实，他们将同它继续战斗下去”。他们知道，“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来自莫斯科的物资支援的迹象”，尽管“在目标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而自觉的亲缘关系”。

美国国务院根据大量报告得知，蒋介石政府“已不再是民族的代表”，它已经成为“与过去军阀无异的腐朽的、不得人心的反动派”，它甚至已经不是反日本的忠实盟友，因此雅尔塔协定不得不背着重庆政府，以免“立即被日本人所得知”。他们知

道，“蒋介石的封建政府不可能与华北一个现代的、有生气的政府长期并存”。

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经知道，蒋介石打算发动内战，而且“共产党人必定胜利”。因此，乔治·马歇尔将军去中国，“协助国民政府极力在广大的地区建立它的统治”。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离华时警告蒋介石说，他的“军事战役将会失败……而且最终导致国民政府的垮台”。

华盛顿当局尽管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却使美国人民连续四年担负了“中国政府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支出”。他们派出以大卫·巴尔少将为首的美国顾问团，将美国的技术知识运用于那注定失败的内战之中。我们可以艾奇逊国务卿的话为证，蒋介石的战斗没有一次“败于缺乏武器或弹药”，皆败于缺乏“斗志”。

举一个永世难忘的例子吧，“中国空军……虽然拥有五千多名美国训练的驾驶员，但是战果寥寥……他们对屠杀没有空中支援的共产党人深为不满”。我的话没有一句能够抵得上巴尔将军的这个报告！我的结论也没有一个能够象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一九四九年三月发出的电报那样有说服力。他在电报中说：“两个月前，此间美国人……不幸亲眼看见几乎完全用美国武器装备的共军占领了天津……这些武器实际上是满洲的国民党军未经战斗交给他们的……此间美国人对美国国会考虑再提供十五亿美元的贷款……感到惊讶”。

约翰·司徒雷登大使最后不得不报告说：“我们的援华计划，甚至被它的直接受益者谴责为一种延长内战的因素……我们承担义务去支持和维护一个把国家利益置之于脑后的不得人心的政府……我们受到了谴责。”

过去，华盛顿为什么要执行这样一种自杀性政策？今天，

他们为什么仍然执行这种政策？白皮书虽然仅仅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却很重要。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杜鲁门总统哀叹道：“只要能够避免，我们是不希望在中国政府里或其他地方有共产党人的。”艾伯特·魏德迈中将的军事报告坦率地承认，共产党如控制了中国，那将导致“拒绝给我们提供作为中间整备地区进行轰炸攻击而用的重要空军基地”，而华盛顿则需要“一个不仅可以提供空中和海上基地，而且从……人力后备的观点来看，可以成为重要盟友的中国”。难怪他的一九四七年的报告至今才公诸于世。这些披露是不会使美国在一个渴望和平的世界中提高自己的威望的。

我们的外交官们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的武将们则利用了这些情况。今天，美国人民必须了解这些情况，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它没有使用外交辞令，而是采用叙事、图片以及交谈的方式，让美国人民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新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的政策；他们依靠这些政策赢得了胜利，并开始重建自己的国家。本来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就是并行不悖的；这些利益就是：友谊，和平，贸易，对公众负责的政府，以及在这些基础上享有的一种稳定、富裕、日益美好的生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目 录

一、往事涌心头	1
二、中国共产党人	15
1. 窑洞之城	15
2. 历史的回顾	27
3. 毛泽东	37
4. 他指引航向	50
5. 打到了沿海地区	61
三、政策	75
1. 你们身上会长虱子的	75
2. 投豆入碗	87
3. 税收——“人民的负担”	97
四、经济政策	109
1. “耕者有其田”	109
2. 新式农民	121
3. 自由企业	134
五、建设新社会	148
1. 为人民办学校	148
2. 妇女运动	160
3. 建立新法制	170
六、军事战略	181

1. 来自农民的军队	181
2. 对付优势武装	193
3. 政府如何转入地下	204
七、中国人征服中国	222
1. 东北根据地	222
2. 农民占领大城市	235
3. 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247
译后记	263

一、往事涌心头

黄昏时刻，风向变了，船民们显露出微笑。现在他们就可以迅速渡过这宽阔的大江了。“咱们的毛泽东给咱们把东风借来啦。你看这兆头。”

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夜晚，炮弹飞过待命出击的士兵的头顶，猛烈攻击对岸的敌军阵地，火光划破夜空。一颗信号弹闪出了亮光。成千上万只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在炮弹掀起恶浪的江面上急驶；喜人的东风鼓起白帆。天破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穿过江南村庄，追击着蒋介石的士兵。老大娘送来了开水，说道：“盼你们好久啦，你们可过江来了。”

在三百英里长的战线上，经过三天的战斗，百万雄师驾着小船横渡了长江。这一惊人的壮举动摇了亚洲的古老秩序。炮弹击中四艘英国军舰^①，这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成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甚至伦敦也找不到抗议的途径。武装的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通行权的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正在接管自己的国家。

许多河口、城市和重镇都象熟透的李子一样落在农民的筐

①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英国军舰四艘向我军开炮。我军进行反击，其中紫石英号被击伤，其他三艘逃走。详见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50页）。——译者

里。南京在第四天被攻占。在上海，邮递员出城来引路。胜利者来到了，他们在十字路口画上前进的箭头。他们不要人民送来的食物，甚至连开水也不喝，“不想打扰老百姓”。他们露宿在中国银行周围的人行道上，不进里面去，“里面有钱，咱们进去会惹事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对最卑贱者和蔼可亲，而对最高贵者却横眉冷对。他们是中国共产党训练和领导的农民。

许多美国人发抖了，“这是莫斯科的势力在进军吗？”然而这些胜利者是挎着美国枪走来的！他们通过电台兴高采烈地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胜过精良的美国武器，我们缴获了送来打我们的武器。”他们称自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一百年来第一次不用外国顾问而赢得胜利的中国人。

是毛泽东下命令：“奋勇前进……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是他给船民们“把东风借来啦”。他是谁呢？他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到过外国。在一所大学攻读了古典的旧学和现代的西学之后，他接受了卡尔·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是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中国情况和解决中国人民问题的大师。在他被封锁在中国农村腹地中的二十多年里，就从贫瘠的西北窑洞里运筹和组织了这一天的胜利。他宣称要把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进行到底，要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他说，这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

它真的和孙中山开创的“国民革命”，和被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扼杀二十年之久的“大革命”一样吗？显然，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看的。几亿农民说：“咱们可有了地啦。”几百万工人

^① 见《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40页）。——译者

在工厂里享有了集体的发言权，他们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次革命。小商人说：“再不会有比蒋匪更坏的了。共产党允许自由经商。”

而爱国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呢？在中国，千百年来，这些学者们的支持从来就决定着政府的合法性。长久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偷偷越过封锁线，奔向新政权。大学生聚集在进军的旗帜下，学习如何管理城市。他们特别把这次革命看做是从外国控制下解放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同盟的高级人士从北平广播说：“整个亚洲的解放开始了。”

亚洲各国人民，从印度、日本到印度尼西亚，都在注视着。整个亚洲正在经历“人民革命”诞生的阵痛，而新亚洲的初生儿就在这里。

我，越过大陆，越过大洋，从康涅狄格州家里注视着。我是多么渴望到中国去啊！我说道：“这不仅是中国的大革命。这是普通人民向整个亚洲进军的世纪，它在唤醒占人类半数的十亿东亚和南亚人民。他们曾经是落后的半数，饥饿的半数，愚昧的半数。今天，他们正迈着前进的步伐。中国已做出了榜样。中国就是他们最新、最近的楷模。中国也是太平洋地区足以稳定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强国。这就可能意味着一种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力量对比的改变。”

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见到的种种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次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当时，十万中国工人离开香港，沿海岸布置了纠察线，阻止商人与这个英国控制下的港口进行贸易。香港一天损失一百万美元，只好向伦敦求救。美国领事对我说：“你知道在西方一阵黄金潮过后，那些被遗弃的城市的景象吗？我恐怕这种情况也会在这座东方巨港发生。”

在一九二五年的那些日子里，中国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军阀统治着各个省、县。为了获得外国的支持，他们把中国一块一块地出卖给外国。北平当时是为外国列强提供方便的对外首都。芳妮·鲍罗廷在北平对我说：“到广州去吧。那才是现代中国哩！我给你搞通行证。”这样我才知道她的丈夫米哈依尔·鲍罗廷是孙中山先生新“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他是接受了孙先生的邀请从俄国到中国来的。当时根本没有其他外国愿意跟孙先生打交道。

我乘坐的英国轮船在广州城外离沙面不远的地方停泊。一艘中国汽艇从岸边驶来，飘扬着一面新旗——青天白日旗，这种旗很快就插遍了全中国。芳妮·鲍罗廷坐在船尾。当我急忙走进船时，她显然松了一口气，“我怕你还带别的什么人来。罢工工人只给了限一个人用的通行证。几个星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允许会见一艘英国船哩。他们请你去看一看广州的新国民政府。”

那就是国民党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的合作——一种不稳定的联合。身着绸衣的官员害怕这些工人的暴力。他们只是利用工人罢工去反对他们的对手——港英当局。罢工工人对这些达官贵人怒目而视，可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又需要他们的照顾。广州摩擦之声时有所闻，然而广州是有力量的。在一次两千女工的群众大会上，从那些罢工者的严厉作风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接管他们国家的力量。

两年以后，在长江上，我看到这种力量被摧毁了。那条有外国炮艇巡弋的巨大水道，总是象一道壁障似的把中国一分为二，只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民族才能够跨越它。蒋介石同上海大资本家及外国列强勾结，控制了南京。国民党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仍在内地，从“红色汉口”行使权力。在那里，我由鲍罗廷

介绍会见了一位中国领导人。鲍罗廷取笑我说：

“斯特朗小姐想参加革命，可是运气不佳。俄国革命她没有赶上，中国革命又来得太早啦。”

我气恼地回敬道：“我还年轻哩！我要呆在这儿，看个究竟。”我不知道这已是她担任“高级顾问”的最后挣扎的一个月，不久他就北逃了。我也没有梦想到中国革命会旷日持久，而当它到来时却又没有赶上。

然而，在那个时候，湖南“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多么迅速啊！中国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是多么迅速啊！他们所办的事是那样切合人民的需要：管制稻米让“人民有饭吃”；设立“人民法庭”审判大恶霸；给穷人兴办“人民学堂”。凡是看到过华南这种“人民力量”的人，即使是象我这样只看到一些余波的人，都不会忘记它的。毛泽东看到了“人民力量”的高涨，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他未来的政策。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二十二年以后，我还在莫斯科翻检过旧信件的复写底稿，打算带到中国去，以证明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判断同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不过我只是写下了这次运动，而他却不但考察了这次运动，并据此设计、制定了政策。

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们身上，也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他们代表十四个省四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到汉口来开会。当时正是盛夏，他们都汗流浃背。老余是上海运输工会的宣传家；老马是广州的老印刷工人；那个从湖南来的老矿工，还在用朝代推算时间。身材苗条的年轻纺织女工，象女大学生在躲避老师一样，笑谈着回家路上如何能避开苦刑和死亡的危险。

这些工人涌进长江沿岸的外国租界——在中国腹地中为外，国所统治的一块块地区——赤手空拳地收回了这些租界。汉口

的高级官员们吓坏了，他们想把租界退还给外国人，但却无能为力。他们对有人民作后盾的力量害怕了。于是汉口陷落了。

中国人民的力量被分裂了二十年，绝大部分转入了地下。我一直相信它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从湖南的农民运动兴起之后，我感觉到那将是一种新的力量、世界民族交响乐中一个新的主题——一个获得新生的古老而智慧的民族的精神。

我从来不愿意去看南京的蒋政权。它是对这个民族伟大而诚挚的人民的力量的极大讽刺。然而，当十年后的一九三八年我再次去中国时，日本的侵略却促成了中国的局部团结。德国人训练的蒋军在上海和南京被击溃。蒋介石把汉口作为他的临时首都。他的支柱中国大资产阶级带着私人财产跑到了香港。他的外国老板：美国、英国和法国，正把废铁卖给日本，并从南面封锁中国。只有一条细长的援助线从俄国通过大沙漠伸进来。于是蒋介石被迫依靠人民了。

这是蒋介石的大好时机。所有爱国人士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不带护卫骑着自行车穿过汉口。他家的一个女人对我说：“过去他只要权，现在他也想要名了。当他的电影镜头受到欢呼时，他非常高兴。”这是蒋介石统一中国并作为其救星载入史册的时机。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与大资本家合流同时又怀仇记恨的军阀。他错过了时机。

我搭乘阎锡山的专列北上，到战区去访问共产党将军朱德领导的八路军。当时，这支部队正在敌后广泛开展活动，已经是负有盛名的了。那是一列军用专车，气氛严峻。餐车的窗户已打破，窗外是零下的气候。我把皂碟里的水倒一点在餐桌上，四十分钟后就结成了冰。我们在卧铺间用木炭盆生火取暖，有一个人被熏倒了。在车厢的过道上，夜间简直无法行走，横七